

退轩抄本《吴梅村先生诗集》考述

陈 腾

内容摘要:程穆衡笺注《吴梅村先生诗集》成书于乾隆朝,隐涉明清鼎革时事,即便经过杨学沆删改补注,仍只能以抄本形式流传。学界关注的程笺杨注是黄丕烈士礼居本与黄永年藏保蕴楼本,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郑师愈退轩本则相对陌生。退轩本为张尔田旧藏,经邓之诚题跋。考证诸本的题跋与识语,进而比勘文字异同,可以理清程笺源流。退轩本传抄自顾文曜如圃本,实为士礼居本之祖本;退轩本与保蕴楼本属于同系分支,两者文本差异呈现了杨注修订前后的不同面貌。抄本实物的字体以及识语,生动反映了乾嘉时期士人抄书、阅读、辑佚的种种细节,也有助于学界深入理解清代“学署抄书”等文化现象。

关键词:吴伟业 程穆衡 顾文曜 郑师愈 《吴梅村先生诗集》

一、引言

有清一代,吴伟业(1609-1672)的诗歌在士人群体中间广泛传播。梅村先生身阅桑海,其诗旁征博引,广涉时事,享有“诗史”的赞誉。读者若无深厚学养,则难以领会诗旨,因此为吴诗作注就很有必要。早在康熙朝,学生辈的钱陆灿(1612-1698)曾批注吴诗,世称“钱笺”。不过钱笺并未独立成书,端赖读者过录于康熙刻本《梅村集》之上而存其体貌^①。到了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期,涌现出三部笺注吴诗的专著,分别是程穆衡(1702-1794)《吴梅村先生诗集》十二卷(以下简称“程笺”)、靳荣藩(1726-1784)《吴诗集览》二十卷(以下简称“靳注”),以及吴翌凤(1742-1819)《梅村诗集笺注》十八卷(以下简称“吴注”)。靳注、吴注皆有刻本乃至翻刻本行世,而成书稍早、部头更小的程笺却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

^①关于“钱笺”,参见毛文璠:《〈梅村诗集〉“钱笺”三种述略》,《文献》2013年第6期,第108-114页。

程笺未能付之枣梨,与其笺注特色不无关系。程穆衡与吴伟业同为江苏太仓人,字惟淳,号迺亭,乾隆二年(1737)中进士,授山西榆社知县^①。次年,程笺初稿便已完成,中间颇历周折。乾隆三十年(1765),程穆衡将吴诗重新编年排次,着重笺释本事,抉发了大量明清鼎革之际的事迹。在文字狱的禁锢下,内容如此敏感的编年体诗注只能依靠抄本悄悄流传。乾隆四十六年(1781),太仓后学杨学沆芟削了程笺原注中的稗史,改用官修《明史》,还增补了吴诗用词引典出处,附于相应的程笺之后,一般称之为“杨补”或“杨注”。

学界常用的两部程笺抄本都附有杨注。其一是傅增湘旧藏的黄丕烈(1763-1825)士礼居本。民国十八年(1929),俞庆恩(1884-1930)将此本铅字排印,收入《太仓先哲遗书》,行世颇广。士礼居本今归国家图书馆,前几年已影印出版,方便利用^②。其二是黄永年旧藏的保蕴楼抄本。此本经潘景郑题跋^③,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黄氏为影印本撰写的前言,言简意赅地总结了程笺杨注的成书与流传经过,并强调了保蕴楼本的校勘价值^④。近来张耕点校的《吴梅村诗集笺注》整理本,即以保蕴楼本作底本,参校士礼居本^⑤。这两部程笺抄本的影印与整理出版,无疑奠定了吴诗研究的文献基石,尤其是张耕整理了诸多异文,洵称程笺功臣。不过,程笺的存世抄本里还有一部嘉庆年间的退轩本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这一部退轩本屡屡见于文学工具书的著录,却一直语焉不详^⑥。即便是冠在卷首的邓之诚先生题跋,也是直到最近才被简略提及^⑦。退轩本的源流,即抄写者、抄写时间、所据底本为何,以及它与学界常用的士礼居本、保

①鲁梦宇:《程穆衡交游与著述考略》,《古籍研究》第71卷,凤凰出版社,2020年,第253-264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69-871页。影印士礼居本,参见陈红彦主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3-4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③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4-285页。

④黄永年:《吴梅村诗集笺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页;后收入《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55-58页。

⑤吴伟业撰,程穆衡笺,张耕点校:《吴梅村诗集笺注》,中华书局,2020年。

⑥金开诚、葛兆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695页。张俊、李道英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32页。陈正宏:《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文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⑦鲁梦宇:《〈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一文简略介绍了退轩抄本,惜未考述其版本源流。另外,邓之诚跋语实有三则,鲁文只过录了第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6-246页)。

蕴楼本之间关系如何,都有待考证。考证的过程难免牵扯到其他的程笺抄本,这些或存或亡的抄本又会引起新的思考:乾嘉时期的士人为何如此热衷于传抄程笺?官方禁书政策的变化对民间抄书活动有何影响?如何跨越地域阻隔,实现多个行省之间的书籍交流?除了藏书家的主动访求,还有哪些渠道促进了清抄本的流通?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邓之诚题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退轩本《吴梅村先生诗集》十二卷,附《诗馀》一卷、《诗话》一卷,一函五册。卷前有邓之诚先生手书题跋三则,全文过录如下(图见封二):

吴诗唯程笺能详其事,不止为梅村功臣,兼足证史,惜世无刊本。近太仓人以黄丕烈传钞本付活字印行,讹舛颇多,纸墨皆恶,不足置几案间。数年前,孟劬先生得此旧钞本,远在黄本之前,致足珍也。先生于吴诗有独好,尝笺释其事若干条。他日倘合程笺并付之梓,岂非艺林一快事欤!己卯六月溽暑逼人,借读一过,聊识数语,五石居士邓之诚。(钤“之诚题记”朱文方印、“云水道人”白文方印)

《志》称迓亭年九十三,据此自跋,诗笺之成在乙酉,时年六十有四。则卒年当在乾隆五十九年矣。此笺诗之功夫,乃报之以大年也。质之孟劬先生,以为何如?之诚又识。(钤“五石斋”朱文铜钱印)

顷方得迓亭所撰《金川纪略》稿本二卷,颇有直笔。知此君固留意史平也,并附识于此。

邓之诚,字文如,号五石斋,所著《清诗纪事初编》考辨吴诗版本,笃实有见。他为这部程笺抄本撰写的跋语包含许多信息,几乎汇聚成一部民国学人研治吴诗的学术史。第一则跋语署年是己卯六月,时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跋中所言退轩本的旧主人孟劬先生,即张尔田(1874-1945)。张尔田曾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庵,又号许村樵人。退轩本钤有两枚张氏藏书印,“观我生室”朱文方印位于目录叶,而《诗笺序》与卷端叶皆钤有“选学家孙”白文方印^①。辛亥以后,张尔田以遗民自居,曾补笺吴诗凡五十三则,存于王钟翰整理的《遯堪书题》之首。邓跋所谓“先生于吴诗有独好,尝笺释其事若干条”,便指此事。张尔田为吴诗作补注,虽说上距程笺成书已近两个世纪,但是两者解诗的方法是相通的,重在阐发“今典”。至于张尔田“尤酷嗜梅村

^①因高祖张云璈,字仲雅,号简松,乃乾隆朝之选学家,故张尔田自称“选学家孙”。此处对三则跋语以及钤印的释读,得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树伟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诗集”的缘故,余嘉锡曾作推测,认为是“身世之感异代同符”^①。

这部程笺抄本也是张尔田与邓之诚交谊的见证物。民国十九年(1930),张尔田结束了海上寓公的生活,随弟张东荪(1886-1973)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燕园里的邓之诚也喜爱吴诗,两人颇多唱和,情谊至深。退轩本的朱笔圈点,疑即张尔田或邓之诚所为。邓氏《清诗纪事初编》一书在“吴伟业”条目下,对程笺作出了“此笺注事,十已得其五六,可谓难能”^②的高度评价,他所依据的程笺正是此本^③。

邓之诚第二则跋语对程穆衡的卒年进行考证,并以双行小字的形式附记第三则跋语,其中评论道“《金川纪略》稿本二卷,颇有直笔”。这两则紧密排列的跋语都没有署年,大约撰于同时。检邓之诚《五石斋日记》1939年7月25日条,适有“阅穆衡《金川纪略》二卷,颇多直笔”的记录^④。显然,后两则跋语当撰写于此日前后。老友去世后,邓先生对退轩本念念不忘,在日记里写道:“靳注……所注之事,又故意隐约其辞,且多牵强处,非善读吴诗者。当以程迓亭注为较佳。张孟劬有一本,今不可踪迹矣。”^⑤此书如今完好地保存于北大图书馆,似可告慰张、邓二公。

披玩是书,邓先生撰写的三则跋语肯定了退轩本的文献价值,娟秀的小楷尤令此书增辉。然而邓跋没有交代清楚这一部“远在黄本之前”的旧抄本有何来历,因此我们有必要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考证下去。

三、退轩本之源流

仔细翻阅退轩本,还会在吴诗、程笺、杨注、邓跋之外发现三条墨笔识语。尽管散见各处,但是利用这些线索与清代方志、档案、别集互参,可以考

①余嘉锡跋语,参见张尔田撰,王继雄整理:《遯堪书题》,《历史文献》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

②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95页。

③遗憾的是,此书何时为张尔田收得及具体经过难以确考,只能结合邓跋与张氏自述略作推测。丁卯(1927)七月,张尔田跋吴翌凤注《梅村先生诗集笺注》云:“程迓亭笺遗闻坠掌,尤资津逮,惜但有稿本未刊,后归黄尧圃、汪闳原两家,近年流落坊市,余曾见之。”(张尔田撰,王继雄整理:《遯堪书题》,第376页)这里张尔田提到黄丕烈本,却未提退轩本,大概是因为他此时尚未获得退轩本,故而张尔田得书时间应在民国丁卯与己卯之间(1927-1939)。己卯邓跋谓“数年前,孟劬先生得此旧钞本”,若将张氏得书时间定在民国癸酉年(1933),不中亦不远。

④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⑤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第4册,第39页。

证出退轩本的抄写者、抄写时间及其底本。

(一)顾文曜抄吾祖望以章山房本

退轩本卷一末有墨笔题识：

乾隆丙午冬十一月二十有五，录于京师宣武门外吾氏之以章山房，如圃识。

此处的“吾氏”非吾祖望莫属，以章山房是他的书斋号。吾祖望字渭微，一字渔璜，海盐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户部郎中，著《以章山房诗钞》^①。上引识语点明了退轩本的渊源，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如圃”先生于吾祖望处抄录而来。接下来就应该顺藤摸瓜，探明“如圃”的真身。退轩本在卷十二末尾补录了“程笈失编三首”与“集外诗三首”，其后是“又一首”《勾章井行》。诗题前有小注：

海盐顾孝廉文曜客山东，见于钞本《梅村集》中，今亦补附于后。

此处“海盐顾孝廉”呼应了识语落款的“如圃”，二者皆为顾文曜。《海盐县志》卷十六有记：

顾文曜字如圃，鸣阳曾孙，乾隆己酉顺天举人。四库馆议叙授，福建仙游知县，杜请托，绝苞苴。踰年，丁父忧。服阕，选四川内江令。在任数年，洁己爱民，培士子则兴书院，彰苦节则建祠宇，民情大和，有“顾清官”之名。素性恬澹，任满即请改教大府，慰留再三，牍数上，始得遂其请……年五十八，卒于定海学署。^②

既然顾文曜与退轩本有密切联系，我们理应对他的生平有所了解，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其生卒年问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顾氏的履历档案，可与方志记载互补。档案全文如下：

臣顾文曜，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举人，年四十岁，方略馆誊录议叙知县，双月选用。今签掣福建兴化府仙游县知县缺，敬缮录履历，恭呈御览。谨奏。嘉庆六年十月二十九日。^③

据此推算，顾文曜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嘉庆二十四年（1819）卒于定海学署。方志又记顾文曜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顺天举人，而退轩本转录其识语说“乾隆丙午（1786）冬十一月二十有五，录于京师宣武门外吾氏之以章山房”。如此一来，顾文曜抄书的具体背景就很清晰了：他应当是在备考顺

①阮元、杨秉初辑，夏勇整理：《两浙轺轩录补遗》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43页。

②王彬修、徐用仪纂：《海盐县志》卷十六，清光绪三年（1877）蔚文书院刻本，第41页。

③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3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18页。

天乡试期间,作客或游幕于同乡吾祖望的住所,抄录了程笈杨补。

继续将方志与档案互参,可以窥见更多顾文曜的生平细节。从顾文曜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再到他签掣得知县缺,中间恰好隔了十二年。熟悉清代科举制度的读者或许已经意识到,顾文曜在这十二年里连续参加了三届顺天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因为乾隆十七年(1752),内府创立“举人大挑”制度以疏通壅滞,规定凡举人三科会试不第者,不许参加会试,但可应六年举行一次的大挑。内府拣选下第举人,“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选,俾得早列仕版”。这项针对落第举子的政策在实践中屡有调整,到了嘉庆五年(1800),上谕“着于辛酉恩科会试后大挑”^①。档案表明顾文曜正是参加嘉庆六年辛酉(1801)恩科会试后大挑的举人之一,签掣得仙游知县缺。顾文曜并无著述传世,我们只知道他在嘉庆十四年(1809)任内江县知县,纂修了《内江县志》五十四卷^②。以上就是“顾清官”的生平梗概,可以看出这一位程笈传抄者属于中层文人^③。

(二)郑师愈抄顾文曜如圃本

退轩本还有两条识语弥足珍贵,它们引出了另一位传抄程笈的“退轩”先生。卷十二第三十六叶有墨笔题:

嘉庆三年,书于汴省学使署中。始于上元前一日,成于上元后四日。

卷十四《诗话》第十四叶又有墨笔题:

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录于光州学署。校文之暇,得是帙于海盐顾孝廉如圃篋中,退轩记。

这两则识语是今人鉴定抄本年代的主要依据,且字体与抄本所附《诗话》《诗馀》一致,显然是同一个人抄写了最后二卷,并记下传抄经过。此人即郑师愈(?-1827),字退轩,国子监生,嘉兴秀水人,郑虎文(1714-1784)之子^④。

①以上关于清代举人大挑制度的介绍与引文,转引自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03-704页。

②《内江县志》稿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影印本见该馆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50-5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③张仲礼先生将清代绅士分为两大集团,各类生员为下层绅士,贡生、举人、进士、官吏为上层绅士。参见氏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6页。考虑到清代进士的社会文化地位高于举人与贡生,本文将举贡视为中层文人。

④关于嘉兴郑氏家族的研究,参见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郑氏家族是嘉兴的书香门第,但是到了郑师愈这一代已经没落。郑氏兄弟为生计所迫而四处游幕,萍踪靡定。许多文学工具书由吴诗而关注程笈,由程笈而注意到退轩本,然而从来没有人考证出“退轩”的真实身份,恐怕也是因为郑师愈长期沉沦下僚,文名不显。

(三)光州学署之会

郑师愈与顾文曜这两位浙江嘉兴的读书人,为何会在河南光州学署相会?想必是他们共同的长辈吴玉纶(1732-1802)起到了中介作用。吴玉纶,初名琦,字香亭,河南光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传世的吴氏滋德堂自刻《香亭文稿》十二卷,刻于乾隆六十年(1796),嘉庆初年又有续编。大约受了闾墨制义的影响,《香亭文稿》几乎每一篇文章末尾都附刻师友与门客的评语,每一则评语都有相应的作者署名,它们由点成线勾勒出了吴玉纶的交游网络。如卷四《罗星定封翁双寿序》末的一则评语说:“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于汉为匡、刘,于宋为曾、王。”^①这一则略显浮夸的评语出自“吾渔璠”,我们知道顾文曜正是从吾氏以章山房那里传抄的程笈。接着翻阅《香亭文稿》,发现卷七《代张伯魁名子振路说》有一则评语出自顾文曜:

先生爱惜人才,振拔寒士,出自天性所乐,凡游先生之门,发名成业,不可更仆数。如伯魁乃有志未逮者耳。伯魁落泊京华,得先生饮食教诲,以府经历注铨。壬子春,又以若翁年迈不及待升斗之养,助之捐分发,而伯魁始得携妻子以归奉其父母,致足乐也。读此说不独为伯魁感,凡游先生之门,受教尤深如文曜者,更怦然于饮水思源之意也。受业顾文曜。^②

前面考证顾文曜的生平,已知他在乾隆己酉(1789)中举后,连考三届会试不第。嘉庆二年丁巳(1797),吴玉纶适因科场案致仕,回到光州老家^③。顾文曜同张伯魁一样,此时是吴玉纶府上的幕客,想必得到了生活上的帮助,难怪评语里充满了寒士对幕主的感恩之情。

另一方面,郑师愈与吴玉纶亦有渊源,其父郑虎文是吴玉纶的房师。乾隆二十一年(1756),郑虎文官河南乡试正考官,吴玉纶考中举人。乾隆四十

①吴玉纶:《香亭文稿》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

②吴玉纶:《香亭文稿》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8册,第329页。

③钱棨《香亭先生年谱》有吴玉纶自述“自丁巳蒙恩致政归里”(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八年(1783),吴玉纶还将其诗文寄给郑虎文,请老师品评点定^①。次年,虎文去世,“无遗产,诸子以教读为生计”^②。乾隆五十二年(1787),时任浙江学政的朱珪(1731-1807)收到了一封汪中(1744-1794)的来信。信中肯乞朱珪爱惜人才,照拂郑家“贫不自立”的诸子,尤其是郑师愈:

秀水郑赞善(虎文),一代名德,且与先师学士有渊源之旧。身后有子三人,皆贫不自立,然清门世学,文行修饬。其第三子师亮,经年卧疾,若存若亡;第七子师靖,寄食亳州,仅能糊口;第八子师愈,才调最美,比于赞善,可云具体而微,又善星命,以之入世,雅俗共赏,向依金粮储。粮储用财有坤道之吝嗇,今又卒官,郑君益无所托。表康成之里,字任昉之孤,不于夫子,其谁望之?且其人国子监生,未有考校之事,荐以一馆,无嫌也,夫子岂有意乎?中与郑君久不相见,时念之,故敢陈乞,幸垂意焉!^③

透过汪中的苦苦哀告,寒士郑师愈的身世宛在目前,令人动容。但是朱珪收到信后,似乎并未遵嘱照拂师愈。因为史料显示,两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郑师愈已在仁和龚家担任塾师,是年乡试前辞馆^④。退轩本的识语则表明师愈在嘉庆初年已经北上谋食,向父执吴玉纶寻求依靠,这才与顾文曜在河南光州直隶州(今潢川县)的学署萍水相逢。

清代学政衙署一般简称学署。学政职掌各地学校政令,定期巡游各府州,举办岁科考试,故而既有平时驻扎的衙署(一般在省城),又有巡考各府、直隶州所设的驻节衙署。学政聘请幕友已成常例,但是定制不准延请巡视省份之人^⑤。出身浙籍的郑师愈自言,传抄程笈的地点是光州学署与汴省学使署。想必多亏了吴玉纶的介绍,师愈才有机会在河南学署担任幕友或书吏。谁知没过几年,吴玉纶也去世了,师愈只能开始新的漂泊。嘉庆九年(1804),师愈馆于江宁^⑥,道光七年(1827)卒。若非龚自珍(1792-1841)替

①关于郑虎文与吴玉纶的交游情形,参见赵晨鸣:《乾嘉文人吴玉纶之交游考》,《文艺生活》2020年第4期,第5-6页。

②邵自昌:《吞松阁集序》,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第1页。

③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笈》,中华书局,2014年,第738-739页。

④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9页。

⑤此段关于清代学署的建制与调整,参考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1-75页。

⑥邵自昌:《吞松阁集序》,第1页。

他作过挽诗,恐怕今天少有人会记得郑师愈这个名字了^①。

行文至此,关于退轩本的源流,大致可以得出结论:乾隆五十一年(1786),顾文曜在北京吾祖望以章山房抄得程笈杨补,是为如圃本。嘉庆二年至三年(1797-1798),郑师愈在河南学署,借如圃本与他人分工誊录而得副本,是为退轩本。退轩本三条识语虽然简短,纸背之后却隐藏着乾嘉时期两位江南书生的游宦轨迹。

四、退轩本与士礼居本、保蕴楼本之关系

(一)退轩本为士礼居本之祖本

退轩本的发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学界通用的程笈版本。在保蕴楼本影印问世之前,学者方便利用的程笈杨注是民国二十九年(1930)俞庆恩所编《太仓先哲遗书》本。俞本所据底本即黄丕烈士礼居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与退轩本的简短识语不同,士礼居本的黄跋风趣盎然,将其来历交代得一清二楚:

岁辛未闰三月三日,有事至嘉兴,因访戴君松门于吴泾桥。松门素爱好古,图书满家,余造访之夕,挑灯茶话,秘笈遍搜。松门以此书相示,余爱之甚,遂乞归,展读一过,知实胜于靳注,为其注时事多所发明也。录此为副,书中写误及原有脱落,未尽改正,愿以异日。钞毕粗对一次,时中秋前三日,黄丕烈识于求古居。

若按照黄丕烈“求古”“佞宋”的藏书志趣,新近传抄的程笈其实没有多大的文物价值。他之所以深深地为程笈所吸引,在于程笈详细注出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事。士礼居本还过录了戴光曾的跋语,乃至每一卷末的识语。据此可以考证出戴本、黄本与退轩本的直接联系。戴跋较长,兹引如下:

读梅村诗,非笈不易解。笈非眼极明、学极博、具知人论世之识无当也。余爱读梅村先生诗,曩于鲍丈廷博处得某氏批本,又阅靳氏所刊《吴诗集览》,采录之,间附鄙见,并注于原集上。客游东闽,存于家。同游郑子师愈于汴省录得此本,为娄东程氏笈,诚善本也。原集分体,此则编年,一善也。靳氏注应详者多略,此则详简得宜,二善也。靳氏书晚出,且窃取他人语附会之,此笈成于康熙戊午,去梅村时未远,又同里,见闻多确,三善也。亟手录副本,越半载始竟。他日归出前手注本,校其异同得失而折中之,有力则刊以传,庶不没笈者苦心而读者亦得其要矣。嘉庆丙寅春三月十有八日,樵李戴光曾记于兴化客楼。

^①龚自珍:《哭郑八丈》,《定庵文集续补》卷上,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第24-25页。

戴光曾,字松门,号谷原,岁贡生,嘉兴秀水人,著有《从好斋诗集》。松门亦好藏书,与鲍廷博、朱稻孙、黄丕烈私交甚笃,每得异书,相互传观借抄,而现存其家藏抄本多部,皆有题跋^①。上面这篇戴跋提到的鲍廷博(1728-1814)所藏“某氏批本”,当指钱笺。戴跋还归纳了程笺的三个优点,最后一处需要辩证。所谓“靳氏书晚出,且窃取他人语附会之”的说法不确,清末刘声木已经商榷过了^②。另外,程笺初稿成于乾隆戊午(1736),戴光曾误作康熙戊午(1678)。

戴光曾在每一卷末都记下了抄录时间和地点,前贤对此未曾措意。最早的一条在卷一末:“嘉庆乙丑(1805)秋八月十日,始于福州学使署,至九月十七日在龙严试馆归云楼,录毕第一卷,松门记。”最晚的一条在《梅村诗话》之末:“嘉庆丙寅(1806)三月,录竟于兴化小楼,戴光曾记。”龙严即龙岩,兴化即莆田。戴光曾为清嘉庆九年甲午(1804)岁贡生,清例“直省岁贡概免来京廷试,著各学政挨序考准,咨(礼)部补授训导”^③。识语所记地点表明戴光曾被授职福建训导,为科考事务而奔波。再结合识语所记起讫时间,可知戴光曾是利用政务余暇,凭一己之力抄写程笺杨注,用时半载。

戴跋所言“同游郑子师愈于汴省录得此本”,正是嘉庆三年(1798)抄成的退轩本。戴、郑二人既为同乡,又同游八闽。借着这些机缘,戴光曾方有机会发现秘笈,大饱眼福之后亲自传录副本。嘉庆十六年(1811),黄丕烈访戴而归,倩工誊抄程笺杨注,再校过一遍。所以说退轩本实为士礼居本之祖本。

(二)退轩本与保蕴楼本属同系分支

学界熟悉的另一部程笺,是解放初年黄永年在沪上修文堂书肆获得的保蕴楼本。该书避乾隆皇帝讳,而嘉庆皇帝的“颺”字初不阙笔,后用粉涂改,故而潘景郑将其断为杨学沆的“写定清稿”^④。黄永年也根据避讳,推断抄写时间尚在乾隆时期,只是他的结论更慎重一些:“虽不必遽定为杨氏补注,其较接近杨补原本而胜于嘉庆时辗转传钞之黄丕烈本及用黄本改窜排印之《遗书》本则殆无疑义。”经过初步校勘,黄永年发现保蕴楼本的诸多吴诗用字异于他本。由于程笺凡例提到“旧刻校讎不精,讹字累累,此本余所手录,悉已更正”,黄永年列举了六条独见于保蕴楼本的异文后,作出判断:

①袁宗刚:《国家图书馆藏戴光曾题跋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32-38页。

②刘声木撰,刘笃龄点校:《苕楚斋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第1066页。

③索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④潘景郑:《著砚楼书跋》,第285页。

“此类佳胜之字，盖皆程笺定本之所更正，不有此钞，殆将湮没。”^①

潘、黄两位前辈无缘得见张尔田旧藏的退轩本。倘若将退轩本、士礼居本与保蕴楼本三者互勘，就会发现保蕴楼本的独特性不止体现在吴诗用字方面；而且这些独特性表明保蕴楼本谈不上“较接近杨补原本”，反而更接近杨补后订本，理由凡五：

第一，从首卷行款与卷端题署来看，退轩本与士礼居本一致，而保蕴楼本独异。前两者首卷皆为十行二十一字，保蕴楼本则是十一行二十一字。前两者的卷端皆题：“鹤市程穆衡迓亭原笺，恒农杨学沆匏堂补注。”保蕴楼本卷端稍异，第二句作“恒农后学杨学沆补注”。

第二，辑佚篇目方面，退轩本较保蕴楼本多录四首佚诗。保蕴楼本卷十二末，只有从朱隗《明诗平论》中辑出的《集外诗三首》，即《山水间想》《杂诗二首》。退轩本卷十二在这三首诗之后，还有顾文曜辑补的《勾章井行》一首，并有小注“海盐顾孝廉文曜客山东”云云。另外，退轩本在《集外诗三首》之前又有《程笺失编三首》，分别是《赠钱臣良》《萧何》《伍员》。士礼居本卷末所附佚诗篇目及其排序，与退轩本完全相同。

第三，保蕴楼本之吴诗存在独特的异文。在这方面，黄永年已经罗列了六个例证，可谓详备。不过，那些都是挑选出来的所谓“佳胜之处”，至于其他异文，黄先生以“原钞间有笔误及小小脱略”一语带过。因此，不妨再罗列一些例证，以期客观评价保蕴楼之校勘价值，并梳理诸本关系。

卷五《赠寇白门》其三“细马驮来纱罩眼”句，诸本皆作“细马”，唯保蕴楼本作“细草”。考吴诗《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有“细马轻车不知数”句，靳笺引李白诗“胡姬十五细马驮”，吴注引《唐六典》：“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为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保蕴楼本不明“细马”之义，误抄或妄改作“细草”。

卷七《李退庵侍御奉使湖南，从兵间探衡山洞壑诸胜，归省还吴，诗以送之》颈联云：“路穿江底闻鸡犬，家在湖中接水天。”诸本作“湖中”，与前句“江底”相对，唯保蕴楼本作“吴中”。程笺在吴诗原注“侍御吾吴洞庭人”之后，补充道：“按圣一六合人，而此云洞庭人者，以别于湖南之洞庭，而非以为吴县人也。”足以证明，保蕴楼本改“湖中”作“吴中”，非是。

保蕴楼本的吴诗异文，还有一个特点是改“胡”作“何”。如卷六《退谷歌》“我生亦胡为”句，以及卷七《题苏门高士图赠孙徵君钟元》“今我不第胡为乎”句，诸本皆作“胡为”，唯独保蕴楼本作“何为”。又如卷十二《赠家园次湖州守五十韵》“谦抑君胡过”句，唯保蕴楼本作“谦抑君何过”。这些

^①黄永年：《吴梅村诗集笺注前言》，第4-5页。

“胡”字明明都是虚词,都被改作“何”。

第四,就杨注而言,保蕴楼本亦存在独特的异文。保蕴楼本前两卷的杨注呈现了较大的变动,详列如下:

卷一《戏赠》其六“君是惠休身法喜”句,退轩本与士礼居本的杨注,引用了类书《山堂肆考》所记维摩居士答菩萨问的“法喜为妻”等语。保蕴楼本此条杨注则引黄庭坚诗“颇思携法喜,举案馐南亩”。

卷一《哭志衍》的杨注也有三处差异。“齷齪”条,退轩本、士礼居本引邵长蘅《古今韵略》,而保蕴楼本则引鲍照诗“小人自齷齪”。“三峡”条,退轩本、士礼居本则引《峡程记》的记载,而保蕴楼本则引王昌龄诗“行到荆门上三峡”。“郛筒酒”条,保蕴楼本引《成都古今记》,而退轩本与士礼居本在其后还有杜诗“酒忆郛筒不用沽”句。

卷一《避乱》其六之杨注,退轩本、士礼居本只有“戈船”与“使气”两条,而保蕴楼本又注了“催租”条,引苏轼诗“水中照见催租瘢”。

保蕴楼本的以上五处异文,呈现出共同的特征,即较多利用宋以前名家诗句替换了原来的类书、韵书、地理书的内容,或补注。不妨说杨注原本所引都是知识性较强的工具书,而保蕴楼本所作的替补,使杨注的诗学意味变浓厚了。

还有一处差异是引文上各有详略。卷二《读史杂感》其六,杨注“张公子”条引《汉书·外戚传》。退轩本、士礼居本摘录了童谣“张公子,时相见”云云,后接“成帝每微行出,常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保蕴楼本则无童谣。综上所述,保蕴楼本的杨注呈现较大变动者共有六条,集中于卷一、卷二的四首诗。

第五,保蕴楼本在杨注之后附录的一些材料,也显得独特。程笈卷二的《梅村》是吴伟业广为传唱的一首七律,保蕴楼本《梅村》杨注之后附尤侗《艮斋杂说》一大段材料,退轩本、士礼居本皆无。又如卷二《琵琶行》之末杨补,保蕴楼本附有靳注,又录陈维崧《摸鱼儿·赋白生弹琵琶》,而退轩本、士礼居本皆有靳注,无陈词。

保蕴楼本的独特性,应该如何解释呢?归纳上述五个方面的差异,发现保蕴楼本的变易内容多与杨学沆相关。杨学沆《吴梅村诗笈补注弁言》自述了补注程笈书的经过,其文甚详:

近亭程先生著《梅村祭酒诗笈》十二卷、《诗余附笈》一卷。分散各类,年经月纬,卓然成一家言,诚可谓体大思精矣。顾先生博极群书,故其原序谓祭酒之诗未许剽中者得窥其崖略。兹之所编,惟贵覆今,无烦征古。若予小子,学识谫陋,综览全书,时或茫其所出。暇日翻阅旧籍,辄为释注若干条。近得黎城靳价人氏《吴诗集笈》一书,阅竟,又增补如

千条。今年春,手录一通,用惠氏《渔洋训纂》例,总附全诗之后,藏之篋衍。虽不免为大雅所轩渠,而后之问津梅村诗者,或假之为岸筏焉。乾隆辛丑上巳日恒农后学杨学沆识。

郑师愈退轩本虽然抄写于嘉庆二年(1797),但其源头实距杨补成书时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甚近。因为退轩本抄自顾文曜如圃本,而顾氏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十一月,便传抄得吾祖望以章山房本。换言之,杨补成书五年之内就产生了至少两部新抄本,而非“藏之篋衍”。杨氏《弁言》又说:“近得黎城靳价人氏《吴诗集览》一书,阅竟,又增补如干条。”如前所示,保蕴楼本共有六条杨注迥异于退轩本系统,且在杨注后不仅附录靳注,还有尤侗文、陈维崧词等新材料。从逻辑上推论,杨学沆完成补注后一度着手修订已说,惜未终卷,故而杨补文本内容的变易集中于卷一、卷二。再联系行款、卷端题署、异文、辑佚篇目等差异综合考察,保蕴楼本的性质存在两种可能,其异文生成的由来也可略作推测。

倘若保蕴楼本确如潘景郑先生所言乃杨氏“写定清稿”本,那么它就是杨学沆在乾隆辛丑(1781)完成补注初稿,并借给吾祖望抄录之后,又重新誊录、略作补正的后订本。这样的话,保蕴楼本的吴诗异文出自杨学沆校改,也有部分是伴随誊录而滋生的笔误。杨学沆在后订本里修改了他对卷一《戏赠》《哭志衍》《避乱》、卷二《读史杂感》的注释,然而未及修订卷三以后的杨补条目。卷二所附尤侗文、陈维崧词也是杨学沆补录上去的。

可惜杨学沆的生平少有人知^①,我们没有机会将保蕴楼本的字体与杨氏手迹进行比对,所以不能排除第二种可能,即保蕴楼本传抄自杨学沆的后订本。那么,独见于保蕴楼本的吴诗异文恐非出自杨学沆本人,更可能是传抄者根据自己的诗学见解所改,或者是抄工之讹。至于卷二所附尤侗、陈维崧的作品,应该是传抄者为了理解吴诗而附带抄录的新材料。

概括地说,退轩本与保蕴楼本皆出自杨补系统,从吾祖望以章山房本、顾文曜如圃本、郑师愈退轩本、戴光曾本再到黄丕烈士礼居本,一脉相承,而保蕴楼本则异。虽不必遽定保蕴楼本为杨氏补注定稿,其较接近杨氏后订本则殆无疑义。

五、退轩本所见清人抄书活动

前面章节介绍了退轩本的弄藏经过,也考证了退轩本的源流及其与士礼居本、保蕴楼本之关系。这些新发现有助于学界重新认识吴伟业诗集的

^①截至目前,仅知杨学沆字湘英,初名云衢,杨宗时之孙(汪学金:《娄东诗派》卷二七,清嘉庆九年(1804)诗志斋刻本,第37页)。

版本流变。除此之外,退轩本还生动地反映了乾嘉时期江南士人抄书活动的种种细节,值得进一步探索。

如所周知,清代书籍生产的主流方式是雕版印刷,但是抄书与刻书并行不悖。与公开而正式的刻本相比,抄本的生成更加灵活随意,也相对隐秘,这两个特点有时反倒成为优势。存世清抄本难以计数,已有学者整合书目、尺牘、日记、别集等文献资料,探索清代抄本文化^①。在此基础上,如何将相对抽象的“抄本文化”这一书籍史研究的热点话题,最大限度地还原到鲜活的历史场景,愚见以为还需近距离地考察清抄本实物。清抄本程笈,尤其是一脉相承的退轩本系列,无疑为我们观照乾嘉时期的抄书活动提供了绝佳的案例。下面先将众人传抄程笈的事迹汇总成表1,以佐证分析。

表1

时间	地点	人物	抄书活动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1781-1786)	未知	吾祖望,嘉兴海盐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	抄程笈杨补,辑程笈失编三首(存疑)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北京	顾文曜,嘉兴海盐人,乾隆己酉(1789)举人	抄吾氏以章山房本
	山东	顾文曜	辑《勾章并行》
嘉庆二年至三年(1797-1798)	河南光州学署	郑师愈,嘉兴秀水人	抄顾氏如圃本
嘉庆十年至十一年(1805-1806)	福建福州学署、龙岩试馆等	戴光曾,嘉兴秀水人,嘉庆九年(1804)岁贡生	抄郑氏退轩本
嘉庆十六年(1811)	浙江嘉兴吴泾桥	黄丕烈,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	抄戴光曾本

以退轩本为连接点,形成了清晰的程笈传抄脉络,并为清代藏书史研究带来不少启示。

第一,退轩本卷末抄录的佚诗是前人层累而成的,这些辑佚成果反映了

^①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参见曹之:《清代抄书考》,《图书馆》1990年第1期,第36-40页。董火民:《中国古代抄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7-90页。大木康:《明清兩代における鈔本》,《明代史研究会創立三十五年記念論集》,汲古書院,2003年,第537-557页;中文版载氏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4-175页。徐雁平、杨芙蓉:《清代的抄书与书籍生产及流动》,《古典文献研究》第20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清人传抄与阅读吴诗、程笈的多维图景。

退轩本附录了若干佚诗,首先是题为“程笈失编”的三首,即《赠钱臣宸》《萧何》《伍员》。这三首诗分别载于康熙本《梅村集》卷十六、十八、十九,不知何故程笈失载?它们很可能由吾祖望辑得。这些辑佚成果看似简单,实则来之不易。若非熟诵吴诗,则必须将编年排次的程笈与分体序列的康熙本《梅村集》校读一过,方能发现三首小诗。其后,退轩本又录有朱隗《明诗平论》所收的《集外诗三首》,分别是《山水间想》《杂诗二首》。最后是顾文曜旅次山东时所辑的《勾章井行》。这些层累的佚诗说明乾嘉时期的文人已经自觉地进行了一些朴素的吴诗辑佚工作,而抄诗、读诗与辑诗是一体完成的。

最末那首佚诗《勾章井行》的来源也惹人遐想。诗前小注只说“海盐顾孝廉文曜客山东,见于钞本《梅村集》”。细想之下,这部“钞本《梅村集》”多少有些神秘。因为对于清代读书人而言,康熙刻本《梅村集》才是吴诗的通行版本,《四库全书》、程笈杨注、靳注、吴注诸书收入的梅村诗皆据康熙本而来。既然康熙本未收《勾章井行》诗,那么程笈之失载就无可非议,而顾氏能辑出《勾章井行》诗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董康(1867-1947)在清末发现了《梅村家藏稿》,较康熙本《梅村集》多出七十三首佚诗。《勾章井行》诗载于《梅村家藏稿》卷三,这个位置并不特殊,其前、其后都有不少佚诗^①。假使顾文曜所据“钞本《梅村集》”出于《家藏稿》本系统,他总不至于对其他佚诗视而不见,唯独钟情于《勾章井行》诗。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顾氏所据的“钞本《梅村集》”既非从康熙本而来,也非属《家藏稿》本系统,而是别有渊源。这一部曾经流通、如今湮没无闻的抄本《梅村集》,暗示了更多吴诗抄本的存在。

实际上,现存吴诗抄本实物已经令人目不暇接,而传世程笈抄本除了退轩本、士礼居本与保蕴楼本,至少还有八部尚待调查。不难想象,清代曾经流通的吴诗与程笈抄本,远远超过存世数量。梅村诗集与诗注的刻本长期通行于世,如康熙刻本《梅村集》直到乾隆后期仍在刷印,而靳注与吴注直到光绪年间还有翻刻本。即便在刻本广布的基本格局下,清代不同阶层的文人还在热情地传抄吴诗与程笈。

第二,这些程笈抄本呈现出乾嘉时期官方禁书政策与民间抄书活动的紧密联系。

^①《梅村家藏稿》卷一《咏史十二首》,较康熙本《梅村集》多六首。卷二多《赠范司马质公偕钱职方大鹤》《襄阳乐》《高丽行》《三松老人歌》四首佚诗。卷三多二首,即《百花骢歌》与《勾章井行》。卷四至卷二十还有部分佚诗,兹不赘列。

乾隆皇帝本人酷爱吴诗,一度题诗“梅村一卷足风流”。即便如此,读书人笼罩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又有谁敢在公开发行的刻本里谈论吴诗隐晦表达的明清鼎革时事?靳注与吴注先后刻成,皆集矢于用典与诗艺,而广涉明季稗史的程笺端赖众人传抄,得以延命^①。笺注者程穆衡、杨学沆都是吴伟业的太仓后学,而后吾祖望、顾文曜、郑师愈、戴光曾、黄丕烈相继传抄程笺,像是一股绵延不绝的潜流。传抄者的身份无一例外都是江南地区的读书人,相互之间的信任颇仰赖同乡交谊。依次看各家的反应,便足以感受到程笺抄本的处境十分微妙。杨学沆将程笺所引稗史改换成官修《明史》,完成补注之后还言之凿凿要“藏之篋衍”,自然是畏祸的托词。若非足够信任,杨学沆以及后续的传抄者是不会轻易向外界分享程笺的。另一方面,退轩本的三则识语及其后的戴跋、黄跋,又证明乾嘉时期江南士人对明清易代文人所记“诗史”抱持浓厚兴趣,潜伏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热衷于传抄程笺。于是,“私藏篋中”与“传抄副本”隐隐构成矛盾。

诸多抄本之中,退轩本是比较特别的:它带有风格相似而笔迹不同的字体。首先可以排除原抄缺损、后人抄配的可能性。因为退轩本共有五册,每一册都是原装书,并无拆装、重装的物理痕迹,而且各册纸张的材质、厚度一致。接着回到抄本生成的原始场景,就会发现退轩本的主体部分十二卷,实际上是同一时间(即识语所记嘉庆三年“上元前一日至上元后四日”)集体分工誊抄而来。也正因此,退轩本方得以六天之内抄毕完工,适与戴光曾亲力亲为而“越半载始竟”形成强烈反差。我们知道,光州地区的书业不如京城与江南那般发达,一时间恐难罗致多名抄胥,而郑师愈偏偏处于“贫不自立”的状态,也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再加上退轩本不同笔迹的字体,风格偏于秀润,属于或接近庠生参加科举考试常用的“馆阁体”。种种迹象表明,郑师愈先在光州学署自行誊抄了《诗话》《诗馀》二卷,来到汴省学使署之后,邀请当地学子或者书吏幕友共同誊抄程笺主体十二卷。

按道理,在学署、试馆这样的官方机构,私下传抄涉嫌违碍的程笺,无疑是冒险的。现在,退轩本的制作居然从友朋间的私下传观借抄,转化成以学署为倚靠的师生间或书吏幕友间的集体协作。即便郑师愈并无传播程笺的主观动机,合抄行为在客观上容易导致长期隐秘流传的程笺传播范围变广,甚至半公开化。如果说此前杨学沆、吾祖望、顾文曜等人传抄程笺,还只是停留在江南文化圈内部的书籍交流,那么河南学署的师生分工合抄程笺,就变成了江南文化圈向中原文化圈的书籍推广,其间潜在的政治风险岂非大

^①程笺先后引用了《崇祯遗录》《明季遗闻》《残明遗事》《明朝小史》《明纪辑略》《先拨志始》《幸存录》《甲申核真略》等明季稗史,有些还是清代官方钦定的违禁书。

大提升!

对此应当作何解释?乾嘉之际,官方禁书政策的松动当是直接原因。乾隆朝的最后十年文网渐弛,发生的文字狱主要有三起,不再像之前那样密集而酷烈^①。嘉庆四年(1799),颙琰亲政以后接受朱珪的规劝,决定终止文字狱,开释了缘坐人犯^②。政治气候变得温和,郑师愈等人才敢在学署分工誊录程笈。当然,这一时期的抄书者具体如何把握官方的尺度,如何应对禁书政策,也与自身胆识不无关系。这就因人而异了。保蕴楼本的传抄者担惊受怕,将虚词“胡”改作“何”,退轩本就没有那样战战兢兢的自我审查。而后戴跋提及好友鲍廷博曾过录“某氏批本”梅村先生诗,可是鲍氏藏书及其题跋里就找不到吴诗的身影,遑论钱笈。所以,我们观察清代官方禁书政策与民间抄书活动之间的关系,既要把握不同时段禁书政策的变化,也不能忽略传抄者的性格差异。

第三,以退轩本为重要连接点而形成的传抄脉络,为清代藏书史研究贡献了一个全新的议题,即“学署抄书”现象。

围绕同一部抄本,尤其是涉及明清鼎革事迹者,乾嘉士人究竟如何展开互动,通过怎样的渠道传抄?毋庸置疑,此类清抄本要实现流通,离不开藏书家群体的访求借抄。黄丕烈去嘉兴,访戴归来,命吴门抄胥过录程笈,便是明显的例子。可是严格说起来,戴光曾虽有藏书家之名,其实“家赤贫”,任福建训导期间能够发现程笈,缘于郑师愈将书携之行篋,带到福建学署。至于郑师愈与程笈的缘分,又拜同在河南学署的顾文曜所赐。顾、郑二人都算不得藏书家,他们只是江南地区的中下层文人。不妨说各地学署的设置,为中下层文人的相聚及其文化交流提供了温床,秘笈得以跨越南北实现流通。

比较三部程笈抄本的后续流通,或者说弃藏经历,更令人感慨万分。退轩本与戴本,无论是文本的校勘质量还是字体的精美程度,明明胜过黄丕烈命抄胥誊录的士礼居本。但是大多数藏书家只知宝爱士礼居本,冷落了更早的退轩本、戴本。黄跋手泽为世所重,所以士礼居本先后经汪闳源、陈宝晋、秀水庄氏、傅增湘递藏,而退轩本则未留下张尔田以前的收藏痕迹,戴本也只有丁国钧的藏印。倘若没有顾文曜、郑师愈、戴光曾冒险传抄在前,则无大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本程笈。前文对退轩本的源流详加考证,足以

^①上海书店编:《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03-209、1138、1140-1144页。

^②曹志敏:《朱珪的理念与嘉庆朝文字狱的终结》,《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2-77页。

证明清代藏书史研究不能忽略中下层文人的抄书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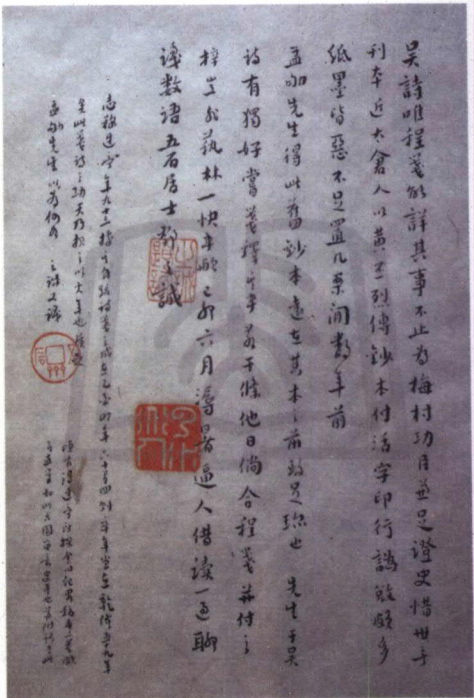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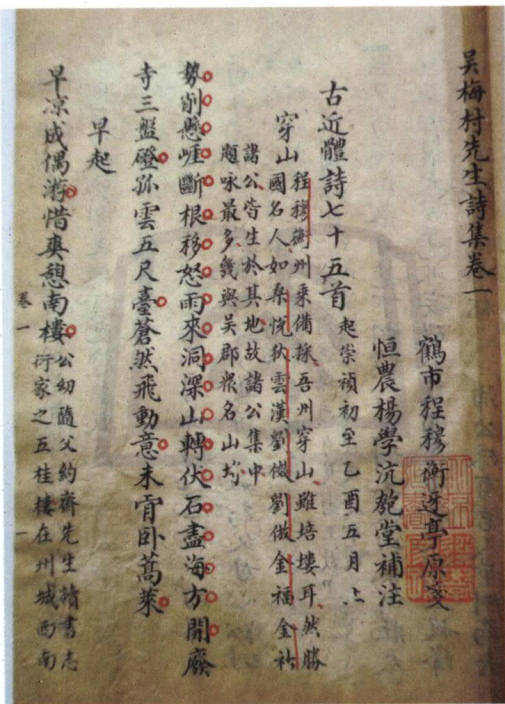
清代中下层文人在科考和游幕的轨道上相互交汇,随身携带秘笈,师友之间互通有无,借观传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地点的转换,新的轨道上必然形成新的人际交汇,由此产生了更多的抄本。海量的贡生举人旅食奔走,他们以学署、幕府为纽带品文论交,无形之中增加了清抄本的流动性,推动其跨行省传播。颇堪玩味的是,在学署抄书而读书的方式早就如盐入水,内化成清代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恐怕连抄书者自身也习焉不察,所以往往只在抄本里简略地记下抄写的场所,如某学署、某试馆,或某位上级官员的府邸。更多的学署抄本与类似书籍并无识语交待来龙去脉,导致“学署抄书”现象长期被学界忽视。

如果说清代“学政刻书”事关地方文教乃至国族命运^①,那么“学署抄书”则指向了宏大叙事的幕后,普通读书人真实而具体的精神世界。从数量上看,清代抄本的主流并非“士礼居本”,而是为数众多的未受藏书家珍视的“退轩本”。如今它们静静地躺在公共藏书机构的普本书库,甚至散落民间,还在呼唤文献学者的垂注。有清一代,“学署抄书”现象在士人群体中究竟形成多大的规模,他们传抄、阅读了哪些书籍,在在令人好奇。有志者当迎难而上,深入调查后作出评估。

感谢匿审专家的详细评论与宝贵建议,笔者获益良多;厦门大学窦瑞敏博士审校拙稿一过,谨致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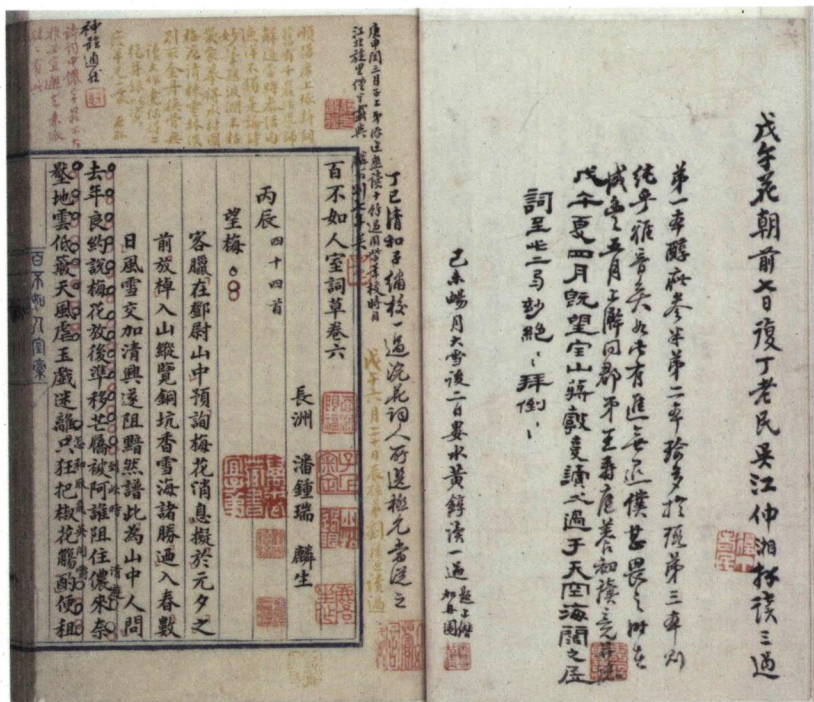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陈腾,北京大学中文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

^①清代“学政刻书”已有专题研究,详见黄政:《清代学政与地方文教——以书籍编刻为考察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退軒抄本《吴梅村先生诗集》邓之诚跋

详参陈腾《退軒抄本〈吴梅村先生诗集〉考述》一文



稿本《百不如人室词草》卷六首叶

详参任轲《稿本阅读与题跋批注：潘钟瑞词集的文本凝定》一文